

医保卡被套现

据《人民日报》报道,5月19日,在湖北武汉武昌区康乐大药房,暂停医保卡结算的通告仍张贴在店内,收银台上的医保卡刷卡机也处于关闭状态。这家药店在一个月前被查出违规刷医保卡销售生活用品,而被暂停医保结算资格3个月。过去3个月,当地像这样被查处的药店已有202家。

很多医保参保人觉得个人账户里的钱只能买药,作用实在有限,如果能用这些闲钱来满足当下生活所需,自然再好不过——商家正是利用参保人这种贪图眼前利益的心理,通过销售日用品来实现表面的“双赢”,可对参保人来讲,一旦生大病,需要自付较多费用时,这笔累积资金的作用便不可小觑。如此套现,未必真占到了便宜。

狗乘车惹麻烦

据《沈阳晚报》报道,5月19日下午,辽宁沈阳市一辆开往火车站方向的公交车上,一名女子以自己的狗生病,着急看病为由,不顾司机劝阻,执意带上狗上车,并为狗投币买了票。司机强烈要求其下车未果时,车上两名乘客竟掏钱给该女子算作退票劝其下车。

禁带宠物乘坐公交车,也算是常识了,各地公交系统对此也早有规定,所以一些人若执意要带宠物乘坐公交恐怕难免引起事端。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像这种急着带宠物看病的情况也会增多,如果一味要求主人打车或者步行,是否有些不近人情?小宠物的出行问题待解。

假的哥遭围堵

据《华商报》报道,近日,在陕西铜川市一小区门口,一辆全身“出租绿”的私家车遇近70名的哥围堵。铜川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该私家车车身很像出租车,疑似拉客时遭到的哥围堵,目前正在调查中。

“山寨党”坏了规矩,乱了秩序,正牌军群起而“攻”之。想想也是,的哥们赚钱本就不易,再有私家车来“抢生意”,难免不触动的哥们的敏感神经。只是,黑车屡打不绝,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地方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坐黑车的人不知道危险吗?这需要多方疏导,全靠“堵”不行。 □韩超

堵住国企违规利益输送的通道

□本报评论员 郭振翔

据《新华每日电讯》5月19日报道,近日,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布。此前,在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的8家国企中,中石化等7家企业均被提及领导人员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国企领导采取委托代理、合作经营等方式,将国企盈利业务安排配偶、子女等亲属开办的企业经营,巨额国有资产收益被蚕食。此外,还有国企领导直接安排亲属开办企业,用于转移甚至“洗白”其贪腐所得。

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因其中有的关涉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有关方面曾经多次出台专门规定进行管控,不过,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例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规定执行得并不理想。有关信息揭示,一些国企领导干部亲属违规

经商办企业已经成为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严肃治理。据报道,国企领导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已被纳入国资委今年专项治理范畴。

一些国企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看重的是国企拥有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和行业垄断地位,他们通过与国企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交易,将国企的资产、技术和资源一步步转移成自己的资产、技术和资源。比如,通过与国企进行技术合作,使得国企的核心技术流失了;通过与国企进行业务合作,使得国企的盈利能力削弱了;通过与国企进行合作开发,使得国企的资产出现流失甚至被“空壳”化;通过与国企的资本运作,使得一些企业实际上换了“主人”。种种现象说明,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的关联交易成了国企违规利益输送的重要渠道。因此,根

治国企亲缘经商腐败,堵住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将国企的关联交易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一些国企,违法的关联交易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存在,甚至成了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破的普遍现象,一是国企“一把手”的权力过大且事实上不受约束,国企内部的关联交易核准程序在种种潜规则的影响下,几乎对国企领导亲属的企业不设防;二是一些国企通过委托招标等方式,规避国企关联交易的审查,给国企领导干部亲属的企业“开口子”,出了问题则将责任推给第三方;三是一些国企的关联交易极少有信息披露,知情的人不敢说,敢说的人不知情;四是国企的内部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司治理形同虚设;五是上级部门对一些国企的监督不到位。

关联交易不是洪水猛兽,但违法的

关联交易危害甚大。关联交易涉及主体关联、人员关联和业务关联。规范关联交易,也应该从主体、人员和业务方面进行规范。一方面,禁止国企领导干部亲属开办与国企经营范围相关的企业,凡是国企领导干部亲属开办的企业都应该进行备案;另一方面,禁止国企领导干部亲属开办的企业参与国企的业务,凡是国企的重大经营合作项目,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其合作方对外进行披露。同时,强化国企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国企关联交易,不仅是国企的内部之事,更是关系国有资产安全的大事;遏制国企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也是关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和强化廉政建设的大事。从规范国企关联交易入手,有望有效治理国企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堵住国企违规利益输送的通道。

盼望出租车行业改革的脚步更快些

□ 邓海建

近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公布,列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9方面39条重点“清单”。其中包括,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随着打车软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出租车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在39条改革“清单”中,有关出租车改革的,不过原则性寥寥数语,但不乏媒体都将之从如海的议题中拎出来,或套红、或加粗,提示公众;这个行业虽是“硬骨头”,但顶层设计“啃骨头”的节奏已启。

“穷则变”。长期以来,在出租车是“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补充”的名义下,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及总量控制制度。“互联网专车”的发展,的哥的姐与出租车司机收入低。加之一些用车软件搅局,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沉疴更为显山露水,各地“祥子不拉活儿”的公共事件,显然无法完全归罪于“互联网专车”的发展;的哥的姐与出租车公司的矛盾,也难以靠讨价还价来调和。以至于今年1月,《人民日报》呼吁,“是时候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了”。

改,是箭在弦上的事。何况,浙江义乌已经在原有机制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义乌市日前公布了《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承诺2018年以后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和出租车数量的管控,而在2018年前的过渡期,综

合人口、经济等因素增加出租车运力的投入。按照改革方案,义乌还将取消营运权有偿使用费,降低份子钱,将政府定价模式向政府指导价、行业定价、协商定价机制过渡。有人问得很直白,义乌面对的,亦是中国各个城市面对的问题,义乌能改的,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效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出租车改革已到了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无非是几个现实因素纠缠在一起:一是行业许可与总量控制已经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格格不入。供需难结,靠修修补补难以疏解。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与成熟的市场机制格格不入。资源配置、收入安排等,长期失衡已酿成诸多苦果。三是过时的产权关系、承包模式与全面深改的大局格格不入。如何重包既得利益的权责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正因如此,不仅改革方案相当“敏感”,各方博弈恐怕也在悄悄地进行。

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了然以上背景,就应当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将改革过程而不仅是事后方案,动态化告知公众——既便于广开言路,集纳民智,也利于新方案赢得更多理解与共识。



检查结果

据《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宜宾男子刘某因腹胀腹痛难忍住院检查,5月18日出院时,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书上写着“怀孕3个月”。目前,医院已对此事作出处理:当事医生杨某写出书面检查,向患者道歉,并被全院通报批评,被处罚3000元,被停止处方权与手术权一个月;全院进行医疗质量与安全排查。

医院的处理可谓及时,考虑得也比较全面,不仅对涉事医生做出惩戒,而且提醒医院其他医生引以为戒。不得不说,时下这查出“男人怀孕”的低级错误对一些医院来说,并不罕见——左腿坏了右腿被手术,手术用具遗落病人体内……有些情况,人们当个笑话也就过去了,但有些则可能给患者造成身体伤害、二次手术等。面对这些低级错误,没什么可深入研究探讨的,唯一需要反思的便是工作态度。

□赵春青/图 林琳/文



治理“野鸡大学”,不能止于公布正规大学名单

□张贵峰

针对日前网上发布的《中国210所“野鸡大学”完整名单全披露》,教育部官方微博5月19日给出权威的“正规高校”名单。截至2014年7月9日,全国共有2542所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见5月19日《新京报》)

教育部此举无疑非常必要。不仅有利于充分帮助公众尤其是广大学子的知情权,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及时明辨大学中的“李逵”与“李鬼”,对“野鸡大学”形成更具针对性的监督。

不过,从全面治理“野鸡大学”,降低其社会危害的角度,公布正规大学的名单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这类“不具招生资格、没有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的“野鸡大学”,政府教育部门还应进一步强化和加大相应的打击惩治力度,以便尽可能地降低其“混淆视听”、招摇撞骗的机会和可能。而依据我国相关法律,事实上也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基本职责所在。根据《教育法》等法律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审批设立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国务院教育

政部门有权予以撤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而根据《中国210所“野鸡大学”完整名单》,虚假高校问题在北京最为严重,210所被曝光的虚假高校里北京有83所,占比44%。这意味着,大量的“野鸡大学”,并不遥远神秘,就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眼皮下。

另一方面,对“野鸡大学”,相关部门应进一步考虑源头上的治理。很明显,“野鸡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假学历、假文凭现象之所以

(上接第1版)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要加强和改进对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统战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发挥工商联对商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服务职能,确保商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强调,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任务,各级党委要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习近平指出,随着“一国两制”深入实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大陆内和大陆外统一战线两个范围联盟中的成员流动更加频繁、联系日趋紧密,要适应新形势,切实做好港澳工作、对台工作、侨务工作。

习近平强调,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重点是科学使用、发挥作用,关键是要加强培养、提高素质。要引导党外优秀人才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习近平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方针,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和,统战干部要发扬优良作风,做到诚恳谦和、平等待人、廉洁奉公,真正赢得党外人士尊重和认同,团结他们同我们党一起奋斗。

俞正声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是指引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不断开创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俞正声说,学习贯彻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精神,首先要把握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在思想上确立起来,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要包容、鼓励在此基础上不同认识和意见。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作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开展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真正把特点规律、做好教育引导工作,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加强基层、特别是县级统战工作,重点做好民族、宗教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率先垂范做统战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担负起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职责。各级统战部门要积极履行贯彻落会议和《条例》精神的主体责任,各级统战干部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要求,全面提升能力素质,努力使统战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统战部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作了说明,要求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中组部、北京市、天津市、湖北省、湖南省、清华大学的代表作大会交流发言。

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金融机构和高校党组(党委),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石英认为,居委会开具过多证明的问题,源自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这表明了社区管理仍然沿袭了单位体制下的居民管理方式,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已经难以维系。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社区定位不清晰。”雷晓康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明确社区居委会的功能,使社区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符的职能。

专家指出,社区遭遇的“证明难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些职能部门推诿、不作为的现状,也反映了部门间信息互不联通,仍存在“壁垒”。一方面,要加快简政放权力度,给人更大的方便;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设置,遏制一些部门的“任性”权力,使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公平的公共服务。(新华社西安5月20日电)

国办发文促网络提速降费

(上接第1版)

《意见》明确,有效降低网络资费,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一方面,要推动电信企业增强服务能力,提高运营效率,多措并举,实现网络资费合理下降,建立健全与各市场主体的合作和公平竞争机制,促进专业化分工合作,探索产业链互利共赢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有序开放电信市场,加强电信市场监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创新活力,推动形成多种主体相互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通过竞争促进宽带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资费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加强电信监管队伍建设,进一步维护好宽带市场竞争秩序,依托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实施“信息惠民”工程。

《意见》强调,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强化

组织落实。推进简政放权、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完善宽带网络标准,完善以宽带为重点内容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加快农村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和,统筹考虑宽带网络作为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位,优化完善基础电信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各地要对基础电信企业在融资、用电、选址、入户、小区进入等各方面给予支持,严格执行光纤到户国家标准,规范通信建设行为,全面保障宽带网络的建设运行,确保公平进入,禁止巧立名目收取不合理费用,解决进场难、进场贵等问题。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加快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切实落实好各项任务措施。

成都优步事件引发的市场与监管之辩

(上接第1版)

记者了解到,对乘客而言,目前优步按照每公里1.3元计费,起价10元可行驶7公里。而对于司机而言,一旦收取乘客10元的业务最终的实际收入是20元,“乘客付费基本上可以算作我们的行车成本,我们赚的那部分主要来源于优步公司的补贴。”优步司机胡师傅告诉本报记者,司机与乘客没有直接交易,具体行车费用按照优步软件计算,且全部通过网上平台代扣,优步公司每周给司机结算。

成都相关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对拼车作出界定,但只要车辆在乘用车中有人得了高额收益,就是一种营运行为,“优步的私家车主在未获取资质情况下,通过搭载乘客获取补贴,很明显与现行法律相违背。”

“无形之手”是否该管专车

专车服务在许多地方因为“非法营运”被处罚,由此也引发了各方对“无形之手”是否该管专车的讨论。

“专车司机的补贴实在太可观了,他们‘玩’着跑半个月甚至比我一个月赚得多。”成都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依靠高额补

能长期大量存在,乃至形成一种畸形的“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中盲目的“文凭至上、学历崇拜”等现象的一种折射和产物。换句话说,有需求才有市场。这种背景下,要想有效遏制“野鸡大学”泛滥,还必须进一步铲除滋生“野鸡大学”的社会土壤,让“野鸡大学”的“文凭学历”,彻底丧失其原本不具有的社会价值。比如,要对那些明知假证,仍坚持购买、使用“野鸡大学”文凭的人,给予必要惩戒;要努力构建“不唯文凭”、“重学历更重能力”的理性人才观和相应的科学的人才评价考核体制机制。

“政府必须要管,不管我们会丢饭碗。”成都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说。

但成都市民李小姐却认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专车网络平台的确实存在不足,但互联网经济应该是在被不断培育、发展和完善的对象,政府的“无形之手”应该呵护和引导新行业健康发展,专车不应一禁了之。

“长期以来,出租车号牌被公司垄断,高额‘份子钱’使出租车司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专车的出现分割了出租车行业的蛋糕。但竞争格局应成为加速出租车领域改革的催化剂,而不是作为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借口。”西南政法大学李树教授表示。

(上接第1版)

——易发纠纷的考量致使“连串证明层出不穷”。居委会出具一些证明之所以过程繁琐复杂,成为“连串证明”,归根结底在于相关部门避免风险和纠纷的考量。

租住在新城区西一路街道办红会社区的外地人王丰收不慎将房东的电卡丢失,电力公司要求他必须让原持卡人所在社区居委会开具丢失证明才能补办。他找到房东后发现,原持卡人是房东已经过世的父亲。这样,他只好让居委会给他开具一连串的证明:既要开具电卡丢失证明,又要证明他和房东的租住关系,还要证明房东父亲已经去世。

“一些敏感事项如收入情况等,社区居委会要要求群众所在单位先开证明,然后我们再开证明”,杨雄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引发纠纷。再比如,计生方面的证明属于比较难开的证明。而社区工作人员对此也是

无法承受的“100多项证明”之重

叫苦不迭:“计生情况对于社区干部是一票否决,真是不敢出问题”。

“荒唐证明”折射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困境

“我们社区内有住户要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工商部门不仅要求我们开证明,还必须要由居委会写‘同意’二字”,碑林区一位社区委员会主任说道,“我们咋能同意别人开不开公司呢?”

这也正是许多居委会面临的问题。不少工作人员表示,居委会“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许多职能部门的工作到基层都下沉到社区居委会中,但居委会的权力和要求则相去甚远。

面对现实困境,部分居委会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进行翔实调查就开具相关证明,还有一些居委会选择了妥协或者变通处理,都让人更觉无奈和担忧。

西北大学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雷晓康表示,目前要求社区居委会证明的内容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其中多是由相关部门向社区的转嫁职能,明显超出了社区居委会能够掌握的信息范围和所承担的职责。

事实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就表示,一些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都把社区公章当成了“万能章”。她建议,应该由民政部门牵头,集中清理要求居委会开具证明的项目。